

新的
驛程



钟敬文著

新的旅程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浩

装帧设计 王向明

新的驿程

钟敬文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太仆寺街39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承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 $\frac{7}{8}$ 字数：40万

1987年10月第一版 1987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书号：10229·0339 定价：5.20元



著者近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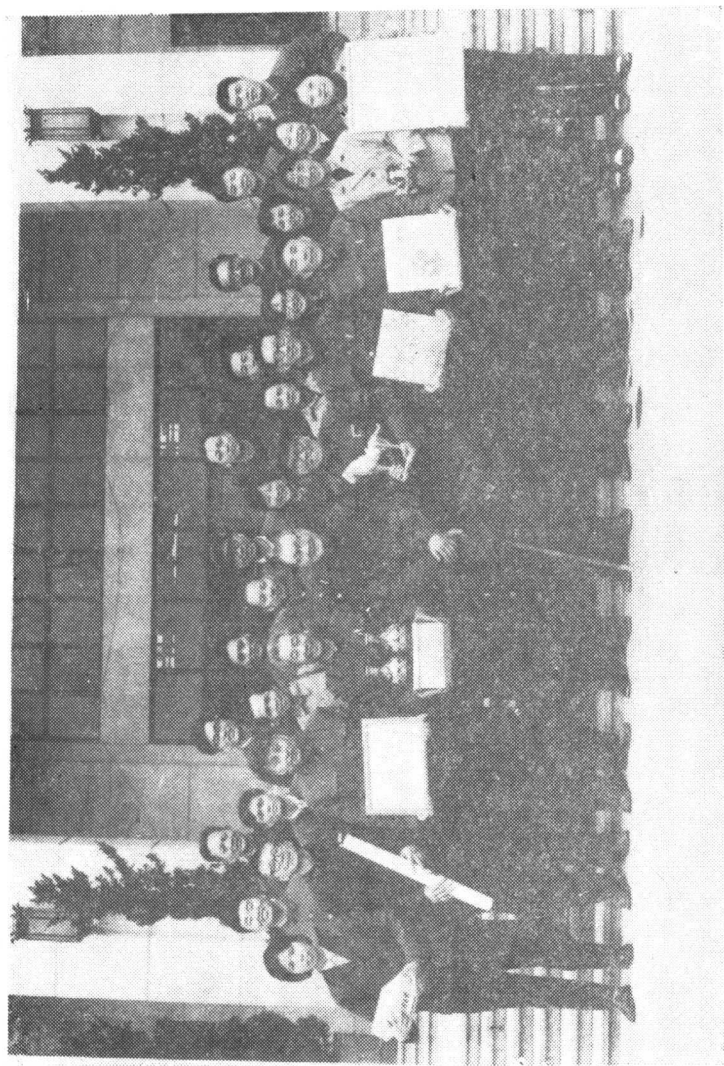
少壮饥驱惯漫煮
年行止有新敲
为援德
学挥红幟来作
丹东十
日留

丹东口占

鍾敦文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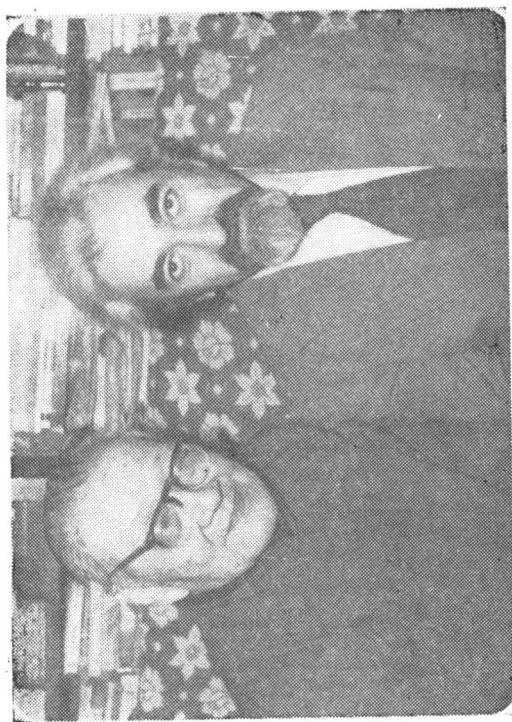
丹东口占一绝



青壯年學界祝賀著者從事民間文藝工作六十周年（一九八三年在北師大）



著者与民间故事学者丁乃通在
报告会上（一九八五年）



著者与来访的苏联汉学家李福清博士合影
（一九八五年）

自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是我国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的一个转折。它是值得庆祝和回顾的一个历史性时刻！

从那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解放运动以不可抵御的气势迅速发展了。许多原来被捆绑着的学艺枝干伸张了。那些一时曾经被打入冷宫的学科夺门而出，走进了广阔的天地。全国性的各种学术协会象雨后春笋那样冒出来。世界学坛的新学理、新方法，象秋潮那样涌了进来。长期在学界居于领导地位的理论、学说，也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机会。各种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里不断出现崭新的著作家和学术成果！……

事实告诉我们：“四人帮”被打倒后的十年间，是我们学术界一个不平凡的跃进时期！

我个人也正是从多年被拘禁、被压抑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的。在这新的时期里，我年岁已经老大了，过去被浪费了的时间再也无法追回，而学术上待动手去做的事情却那么多，这就大大加强了我对社会负荷的责任感！大大加强了我对眼前工作着手的迫切感！跟这同时，我

向来所致力的那两种学科：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也正由许多青壮年同志们的努力，在历史新形势下出现了许多繁荣的气象。因此，我真恨自己的力量太小太弱，觉得只要身上还有一分力，就得抓住时机，把它使了出去！多年来，正是这样做了的。现在我充分体味到前人所说的“不遗余力”这个成语的真意和重要性。

在“四人帮”被打倒后的十年里，象前文所说，我竭尽个人力量，在所提到的那些学术园地里，播种施肥，挥汗灌溉，虽然力量绵薄，总算取得一些成果。这种成果，有许多是存在于社会的，有些是存在于自身的。但即使是自己份内的收获，也都含有同志们的辛劳在内。

这个集子里收录的、长短不齐的几十篇文章，就是那些属于我的成果的主要部分。现在由于中国民间文研究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一些同志，为了纪念打倒“四人帮”十周年民间文艺学界理论方面的活动成果，倡议并动手把它辑集付印。这使我感谢，也使我惭愧！因为十年的岁月不算短，而我的成绩却如此寒伧！如果这些大半即兴写成的文章对于当前正蓬勃发展的我国民间文艺学界和民俗学界，在理论和其它工作上有些微裨益，那就不负同志们的好意和尽力，对我自己也是一种荣幸了。

我主要是搞理论工作的。对于长期致力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的问题，当然会有些自己的见解。何况这十年是一个历史的新时期——非寻常可比拟的新时期，它要深深地唤起我们对这方面理论工作的反省和深思，就是更自然的事情了。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环顾我国近年来社会科学界、人文科学界所呈现出来的大致相似的情形，那道理就可以了然。自然，我们学界今天的反省、深思，并不只是为了判定历史的是非；更重要的，却是为了今后大家能够更加明智地工作（我要声明一下，不管是关于历史是非，或是为了未来的明智，都是包括我自己的活动在内的）。

在近年来我对理论工作的反省、深思中，有两三点是比较突出的。现在我把它论述一下。

首先，是对民间文学特点的认识问题。

民间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在各方面都存在着自己的特点。它的创作者、接受者、传播者、表达媒介、传布过程、艺术传统以及作品的内容、形式等，都与一般专业作家的书面文学存在着各种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差异。而民间文学本身，它们彼此间又大概都有着共同的现象和性质，形成一种特殊的文艺类型。因此，我认为对它的考察观点和研究方法，必须与对一般作家书面文学相对地分别，即应有它自己的文艺学——“民间文艺

学”。文艺学，在逻辑结构上，当有两个不同层次，即“一般文艺学”（它是概括了作家文学、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理论体系。现在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学”，其实，主要是专业作家文艺学）和所属支学层次。所谓支学层次，应该包括专业作家文艺学、通俗作家文艺学和民间文艺学。这些各有自己的大体范围和特点，作为一种支学，是彼此相对地分立的。而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彼此又是相互联系和互相渗透的。但是，不能因为后者情形的存在，就把前者的相对疆界给判除了。

我过去（一九三五年）虽然创用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学科术语，并对它的对象、特点和研究方法作了简要论述，但是对它与作家书面文学的疆界，概念始终比较模糊。这种概念比较明确的出现，是近年来学界解放思想大浪潮影响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本集的文章里不止一处提到。虽然没有很详细地阐述，但大意是说出来了。只要同志们比较熟悉民间文学作品及有关情形，并对问题稍作冷静的思考，道理是不难明白的。

其次，是关于民间文学研究的多角度问题。

民间文学作品，我们既然承认它是一种文学，自然应该把它作为文学现象加以研究。但是，向前文所说，作为文学现象，它跟作家文学有多方面的差异，而自身

(各体裁间)又大体有一种共同性。因此,它的研究不是普通文艺学,而应该是具有相对独立性质的民间文艺学。其实,民间文学不仅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它还是一种综合艺术现象。例如,民歌的音乐性质、演唱情况及其与舞蹈、乃至原始戏剧的血亲关系,民间故事的讲述的语言声调、表演姿态等因素,都说明民间文学作品不是单纯的文学现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在内容上或活动上,又与政治、法律、宗教、社会组织、生产活动等血肉的关系。这是一般作家文学比较少有的(专业作家作品也有涉及政治、法律、宗教等社会事象的,但从牵涉范围的广泛和关系程度的深入等方面看,两者是不可能同日而语的)。至于那些与生产活动直接结合着的歌谣、谚语,与宗教仪式直接结合着的神话、传说,以至用歌谣去充当法律条文等,更不是作家一般文学(特别是现代文学)所经见的。

民间文学,由于它产生和流传于社会分工还不很发达、并且一般成员不能使用文字这一工具的社会阶级,它的这种特殊性是自然存在的。因此,对它的考察、研究,就不能限于文艺学的(即使是民间文艺学的)。它必须、也必然是多角度的,用各种社会、人文的学科的观点、方法去进行的。这样,才能比较全面地、从而

也是比较深入地揭示它的特点和性质。我们知道一种科学的性质、名称,主要是由研究的对象决定的。要认识这种道理的必然性或当然性,最好是去请教学术史或学界实际现象吧。民间文艺学作为一种科学,在欧洲的兴起已经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把它(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等)作为纯粹的文学现象去研究的,虽然不是没有,但并没有取得独占的地位。拿神话学来说罢,从前世纪中叶以来,那些有名的学派,如语言学派、人类学派、传播学派、历史批评学派,以至精神分析学派等,它们的研究观点和方法都不是文艺学的。即使在民间文学品种中,本身文学性比较强的民间故事种类,世界学者们对它的研究也是多角度的。奥国故事学者 M. L. 冯·费兰兹在她的近著《民间故事里的女性》中就指出,现代研究这种人民创作的角度(方法)有四种:(1)文学的,(2)历史的,(3)民俗学的,(4)心理学的(她自己的研究角度是属于最后一种)。苏联学界虽然多把“民俗学”一词作为“口头创作”的同义语应用,并且对它相当着重文艺学的研究,但他们却又把它作为“民族志学”的一部分,去进行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的研究。那位世界知名的普洛普教授,他既是名著《魔法故事形态学》的作者,同时又是《俄罗斯祭祀》的作者,并在后一书中大量援用了俄罗斯民

间歌谣。从我国现代的学术史看一样可以得到启示。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源地。《歌谣》周刊的发刊词，开宗明义，就说明他们的研究有两个目的：一是文艺的，一是学术的（民俗学的）。此后学界这方面的实际研究角度，除文艺学的和民俗学的以外，还有教育学（儿童学）的、方言学的、方音学的、历史学的、以及社会学的、民族学的等等。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前夜。拿神话研究来说罢，那有着比较显著成绩的茅盾、闻一多的著作，主要不是用文艺学的眼光和方法去看待和处理对象的，尽管他们本身是地地道道的文学家。这种种学术史的昭昭事实，能说是偶然的、少数人的偏见的结果吗？我想，肯用脑力的同志是会承认其中的必然道理的吧。

关于这个问题，据说有人不大同意我的看法。主要理由是，多角度的研究会削弱（甚至于取消）民间文学的文艺性的研究，将导致这方面研究成果的损失。我认为对民间文学的多角度研究是根据学科对象本身的特点和要求而产生、发展的。它的得失，已经有世界科学史大量事实的证明。至于我们这方面学术的未来结果，就让将来的科学史去说明吧。

再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运用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包括方法论）是指导我们国家

社会生活的基本理论；同时，也是指导我们民间文学事业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所以要这样做，据我个人的经验和体会是：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等的理解，在我所接触到的许多世界性学理中，总的说来，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更有说服力的。但是，在这里，需要有些补充说明。首先，这里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原理”（恩格斯语），而不是导师们在任何不同时候，对任何人物、事件所说的任何一句话（自然，这些话，我们也要用导师的科学精神去学习它）。其次，是我们必须注意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的消化和运用。过去，我们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上有着不少成绩，但也无可讳言，同时也有些偏差乃至失误的。象本书中一些文章所指出的（也是近年学界许多同志所指出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庸俗社会学等现象经常可以见到。这样做，既不符合我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不利于我们社会主义新文化、新学术的实际建设。这是历史所验证了的。我所以在文章里一再提到这个问题，主要意思还在于总结过去经验，以便进一步增进我们的思想和实践效果。而这也正是在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应有的认真态度和反思。

几年来，中央负责同志谆谆劝告大家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什么原因呢？这正是认真地总结过去实践经验所得出的可贵结果呀。我们都是历史教训的经验者，今后大家都会、也应当变得聪明些。真正愿意紧抱教条主义等以终老的同志，我想到底是比较少数吧。

除上述三点外，还有一些与理论有关的问题，因为篇幅有限，不容许多谈，只能比较简单地接触一下。更详细的论述，只好等待别的机会了。

（一）、前几年当我那篇《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演讲稿在《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后，听说有些同志着眼于那个“新”字，认为这是有意否认延安文艺讲话的革命传统。对此，现在我只想约略说点自己的看法。一般所谓“新”，大都是对待原有的情况而言，例如我们现在说“新时期”、“新长征”、“新风尚”，乃至传统的惯用语“新年”、“新正”等。它只表示所指的事物、现象、含有新成分，新性质等，并不一定是对过去的否定，特别是全面否定。否则，对于“新时期”、“新长征”等词，怎样解释呢？难道我们的“新时期”要对于过去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事业都否定了吗？难道号召“新长征”就得否定二万五千里长征了？大概头脑正常的同志是决不会同意这种解释的吧。我当时所

发表的那个不成熟的讲稿，是在新历史条件下，提出个人对建立这门人文科学体系的一些想法。不管我的设想对或不对，这种学科的体系，恕我孤陋寡闻，在我们这方面的学术史上，是从没有人提出过的。说它是“新”的有什么不妥呢？至于对这门学科的遗产，我们既要对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本身的成就等加以考察，也要根据今天这门学科所达到的水平和学科建设的需要，加以评价和去取。在这个原则上，不但延安文艺讲话的新理论要受到历史主义的尊重（本书的文章，不知多少次称道过这份宝贵遗产及其影响），就是“五四”以后从北京大学、以及抗战时期，我国各种学者们这方面的活动成绩，也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加以分析、批判和吸取。这是我们所担负的、科学史的一桩严肃任务。

（二）、年来我国学界人士，对孟姜女故事的起源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其实也是旧有的看法）。明白一点说，就是有人反对顾颉刚所论证的孟姜女的前身是春秋时的杞梁妻的说法。从隋、唐传下来的孟姜女故事，那女人公是否真的为先秦文献中所说那位折服作法不合礼仪的齐君的未亡人呢？置疑这个问题的学者不始于今日，也不限于国内（象苏联汉学家李福清、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饭仓照平，都曾经表示过这种怀疑）。我自己几年前在草写《为孟姜女冤案平反》论文时，这个老问题一